



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 经济组织活动

契斯諾科夫著

5740

时代出版社



蘇維埃社会主义國家的經濟組織活動

蘇聯 契斯諾科夫著

羣 力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ОРГАНИЗАТОРСКАЯ ДЕЯ- ТЕЛЬНОСТЬ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 СТИЧЕ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Глава из книги Советское Социалисти-
че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2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蘇維埃社会主义國家”中的一章。它論証了作爲無產階級社会主义國家的蘇維埃國家所具有的經濟組織活動的職能，並簡明扼要地闡明了蘇維埃國家在各個不同發展時期的經濟作用。作者還用相當的篇幅敘述了蘇維埃國家在從社会主义向共產主义逐步過渡的時期中的經濟組織活動。

时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外西門外大街出版大樓)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第一印刷廠印刷・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6年6月北京初版

1956年6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32 1/32

印張:3 字數:67千字

1—C9900冊

定價(70,28元)

目 次

第一節	蘇維埃社会主义國家在从資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時期的經濟組織活動	7
第二節	蘇維埃社会主义國家从第一个發展階段向 第二个發展階段的过渡和國家的經濟組織 活動的發展	32
第三節	蘇維埃社会主义國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 經濟作用	48
第四節	蘇維埃社会主义國家在从社会主义逐步 过渡到共產主义時期的經濟組織活動	69

生產資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生產關係是由於社会主义革命而產生的，是在同資本主义所有制和資本主义的生產關係進行斗争中產生的。工人階級不去夺取政权，不把無產階級專政作为对旧的經濟实行革命改造和組織新的社会主义經濟的槓桿，那末新的社会主义的經濟就不会產生和鞏固。

为了達到这些目的，社会主义國家把土地、銀行和大工業收歸國有，把这些財產变为全民的財產，鎮压了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剝削階級的反抗，組織了革命的武裝部隊來保衛國家和保障工人与農民的和平的建設性的勞動，鞏固了正在進行社会主义建設的工人階級和全体勞動人民与各資本主义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勞動羣众之間的联系。社会主义國家把一切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階層團結在工人階級的周圍，保證了工人階級对一切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階層实行國家領導，吸引全体勞動人民來參加社会主义建設，並用共產主义精神改造他們。

社会主义國家是全民的社会主义財產的代表，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類型企業的所有者。社会主义國家是社会主义經濟体系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工人階級建成社会主义和消滅階級的主要武器。

只有徹底新型的國家，即無產階級的社会主义國家才能解決所有这些任务，因为社会主义國家不僅根本改变了旧的剝削者國家所特有的各种職能，而且还產生了各剝削者國家所沒有的新的職能。社会主义國家的經濟組織活動和文化教育活動就是这种職能。沒有这种新的職能，社会主义國家就不能成为把旧

的經濟改造为新的社会主义經濟的槓桿。这一新的職能是一个經常起作用的職能，它將随着社会主义國家的發展而發展着和擴大着，即使在社会主义國家消亡以后，它也將作为共產主义社会管理机關的職能而被保留下來。

在这一章里，我們只談一談这个新職能的一个方面，即只談一談社会主义國家的經濟組織活動，至於这个新職能的第二个方面——文化教育活動——則僅根据闡述和分析新職能的第一个方面的需要而加以必要的說明。

政权之轉歸工人階級掌握，必然和在資本主义条件下集中在資產階級手中的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之轉歸社会主义國家所有密切結合着。於是國民經濟的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成分便建立起來了。生產的社会性獲得了与其相適應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这就給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無限廣闊的場所。國民經濟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長不断地鞏固着社会主义國家的經濟實力。

斯大林同志在同威尔斯的談話中把社会主义國家与資本主义國家加以对比，他說：經濟，按其本身的含意來說，它是很少与資本主义國家有關係的，因为它並沒有掌握在資本主义國家手中。“相反地，國家是握在資本主义經濟手中”^① 資產階級國家既不能消除資本主义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也不能消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資本主义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其中包括對部分國有化的企業的干預，只會加強資本主义壟斷組織的統治，因為國家壟斷資本主义的實質就在於資產階級國家与資本主义壟斷組織達到如此密切的地步，致使國家完全服從於資本主义壟斷組織。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實行“計劃”經濟的企圖，會使壟斷組織

① 斯大林：“與英國作家威尔斯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頁。

更直接地和更無限制地利用國家來加強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使中小企業破產並吞併它們。在這種“計劃”的條件下，大壟斷組織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取得有利可圖的國家訂貨，獨佔原料產地和原料儲備，使用國家補助金等等。資產階級國家更加狂暴地扭緊稅收壓榨機，增加國債，與此同時，壟斷聯合的收入也與日俱增起來。對於壟斷聯合來說，國家不僅是壓迫勞動人民的機器，同時也是榨取捐稅的機器，即為了壟斷資本家的利益而直接掠奪羣眾的機器。

資產階級國家對壟斷組織的這種從屬關係，過去在希特勒德國是這樣，目前在英國和美國也是這樣，特別是在粉碎法西斯德國之後，美英兩國對壟斷組織的這種從屬關係更進一步加深了，儘管在表面上這種從屬關係表現為各種不同的形式：在美國，壟斷組織用一種直接而卑鄙的形式吞併了國家機構，由壟斷組織發號施令支配總統和政府；而在英國，壟斷組織則採取實行資本主義的“國有化”和工黨“計劃”這種偽裝形式。

正如在英國所暴露的那樣，資本主義國有化的特徵是：(1)僅僅某些工業部門實行了國有化，而那些能夠取得巨額利潤的主要的工業部門，則仍然保留在資本家手里；(2)資本主義國有化僅僅包括那些服務於壟斷組織的輔助的部門，過去不賺錢並使其私有主經常虧本的部門；(3)支付給原所有主的補償費時常是超過國有化企業的实际價值，資本家仍然握有原來的資本（如果不是更多的話），而只不過改換一下資本家掌握的有價証卷的形式而已；(4)國有化企業的管理工作仍然由原所有主或其代理人擔任；(5)個別工業部門的資本主義國有化被資產階級國家用來給各企業主提供新的利益，其方法是由國家供給企業家廉價的商品和補助，而與此同時，還迫使國有化工業部門的工人更加緊張地勞動，而把工人的工資依舊保持在低微的水平上。

这就是英國資本主义國有化的實質，其目的是为了鞏固資產階級的陣地，增加壟斷資本家的收入。無怪乎保守党人为了策略上的目的而大肆叫囂反对工党在这方面的措施，但並不急於取消工党所实行的給資產階級帶來新的利益的“國有化”。

在准备發動帝國主义战争時期及战争時期，資產階級國家對於經濟生活的“干預”更加猖獗起來。現在美國和英國就正是这样，在那里，正像在德國法西斯当政的時候那样，國家執行着帝國主义壟斷組織首腦的意旨，正在准备發動爭奪世界霸权的战争，使經濟軍事化，開展軍备競賽。从表面上看來，这是國家對國內經濟的“調節”作用的加强，但是实际上，美國和英國所执行的政策証明，國家是完全服从壟斷組織的支配的。帝國主义战争的政策不能不使資本主义所固有的生產無政府状态更加混乱和極端尖銳化起來。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美國以及其他各國，即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屬於剝削者而由資產階級掌握政权的國家里，資本主义經濟的發展是自發的，实行“調節經濟”的任何企圖也無法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籠罩着資本主义世界的日益逼近的危机。实行國家經濟軍事化是为了人为地抬高行市，使資本主义壟斷組織从中獲取巨額利潤，延緩經濟危机的擴展；但是，歸根結底，这只会使危机的破坏作用增大。有些資產階級活動家開始認識到这一点。例如：1952年初，美國國會的官方公報“國會通訊”曾發表过內布拉斯加州众議員、共和党人巴菲特的一篇声明，他在这篇声明中說：“美國軍事計劃的目的是企圖在全世界建立美國的軍事統治，这个計劃是輕率而危險的，並且也决不能維持下去。”巴菲特接着說：近几个月以來，美國兩党的代表“預先警告國民了解我國对外政策的危險性。正像他們如此理智地指示我們的那樣，我們必須重新審查我們的政策，以便減少政治上和經

濟上的危險……現在我們在世界各地的軍事行動，如果仍然繼續下去，那怕是時期很短，我們經濟上的破產也是不可避免的。”

資產階級國家對於經濟生活的“干預”，不僅不能消除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發展的自發性質，反而會加強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自發作用，使競爭、危機、失業、貧困和羣眾的破產現象更加尖銳化。

英美帝國主義者以及他們所領導的整個帝國主義反動陣營，正在準備着新的戰爭，把準備戰爭的重担壓在勞動人民的肩負上，使他們的狀況愈益惡化，使他們受着新戰爭的不可勝數的災難的威脅。

蘇維埃國家的狀況則完全不同。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對抗性的矛盾，沒有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經濟危機。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是在國家對於經濟實行有計劃的領導的條件下發展着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以新的規律為基礎的，這種規律是與資本主義的規律有着原則上的區別的。蘇維埃國家依靠着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領導經濟，實現其經濟組織職能和文化教育職能。

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職能都是彼此密切地聯系着。經濟組織活動與文化教育活動是與保衛和鞏固蘇維埃社會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所有制——分不開的。蘇維埃國家的建設活動，是以保衛蘇聯人民的和平勞動，抵禦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的侵略行動的職能為前提的。所有這些證明，蘇維埃國家的內部職能與外部職能有着密切的聯系。這是必然的，因為經濟與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系。蘇維埃國家所實行的任何一種經濟措施都帶有政治性質，並且也只有國家的各種職能密切地相互作用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反之，任何一個政治措施都是這樣或那樣地

涉及到經濟。

“……在實踐中，”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政治和經濟是分不開的。它們兩者一同存在，一同起作用。誰想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把經濟和政治分開，以減弱政治工作為代價來加強經濟工作，或者相反地，以減弱經濟工作為代價來加強政治工作，那他就一定要陷入絕境。”^①

蘇維埃國家的經濟組織活動是通過下列各種國家管理機關實現的：蘇聯部長會議；國家計劃委員會；部長會議直屬的各委員會和各總管理局；各部，首先是主管經濟的各部；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的部長會議與各部以及各計劃機關和經濟機關；地方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及其各處、局等。

蘇聯部長會議統一並指導各部的工作，直接領導實現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預算的工作，鞏固信貸貨幣制度的工作。蘇聯部長會議通過各個經濟組織和各個經濟槓桿的整個體系組織並指導國家的全部經濟生活。

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組織活動隨着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而日益擴大着，經濟管理機構也不斷地成長和日益複雜起來。經濟管理機構是國家機構的一部分，即使在將來，在消除資本主義的包圍和建成共產主義以後，它也不會消亡，但它隨着國家的消亡將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質。

第一節 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在從資本主義向 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經濟組織活動

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後，它就開始執行經濟組織工作職能

① 斯大林：“論黨工作底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分子及其他兩面分子的办法”，人民出版社1953年單行本，第42—43頁。

和文化教育工作職能。但是，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正像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那樣，這個職能並沒得到充分的發展。當時，蘇維埃國家必須頑強地堅持反對白匪軍和國外武裝干涉者的鬥爭，不斷地鞏固國防力量。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國內進行着與資本主義成分的鬥爭，在這種條件下，不能不把鎮壓剝削者的反抗和限制資本主義成分的任务提到首位。在革命的初期，工業和運輸業是不夠發展的，同時小商品的農民經濟還沒有集體化。社會主義成分在國家經濟中還遠沒有取得優勢的地位。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組織活動和文化教育活動是為了恢復工業和農業，全力培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以蘇維埃政權的精神，以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精神對勞動者進行政治教育。只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第二個階段，經濟組織職能和文化教育職能才獲得了充分的發展。

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第一個階段的條件下，經濟組織工作與文化教育工作的職能解決了那些經濟任务呢？這個職能對保證工人階級在國內戰爭中的勝利，對結束國內戰爭和粉碎外國武裝干涉以後國家工業和農業的恢復，對社會主義經濟的建立，對剝削階級的消滅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蘇維埃國家的經濟組織活動與文化教育活動，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樣，是從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的头几天就已經開始了。在列寧的綱領性的著作“蘇維埃政權底当前任务”，“論‘左傾’幼稚病與小資產階級性”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中，闡明了蘇維埃國家着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政策。但是，這一綱領的實現被國內戰爭和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武裝干涉打斷了。

在國內戰爭的年代里，蘇維埃國家不得不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即著名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斯大林同志表述了這一政策的實質：“戰時共產主義是戰爭環境和武裝干涉迫使無產階級專

政採取的一種政策；這種政策主要是採用經濟以外的、帶有某種軍事性的手段，不是通過市場，而是在市場以外來建立城鄉之間直接的產品交換，這種政策的目的是組織產品的分配以保證對前綫革命軍隊和後方工人的供應。”^①

在粉碎白衛分子和武裝干涉者以後，這種政策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必要。因此蘇維埃國家就通過市場着手建立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繫。正如列寧在“論糧食稅”以及其他著作里所指示的那樣，社會主義城市與小商品農村的經濟關係在初期只有通過商品交換，即商業才能實現。

大家知道，當時蘇維埃國家正經受着經濟破產，這是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為反對地主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和外國武裝干涉者的三年國內戰爭造成的後果。1920年，大工業的產量少於戰前6倍。運輸業被破壞了。鋼鐵、煤炭和布疋的儲備幾乎消耗殆盡。農業出產量僅等於戰前產量的一半左右。甚至連最必需的物品，如麵包、肉類、食油、靴鞋、服裝、火柴、食鹽、煤油和肥皂等也都極感缺乏。斯大林同志說：“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大家都忍耐着這種物品欠缺的情形，有時甚至還不復覺察到這種情形。但現在已經沒有了戰爭，於是人們就忽然感到這種物品欠缺情形不堪忍受，而要求立刻把它消滅。”^②

首先在農民中間發生了一種不滿情緒。在與白匪分子和武裝干涉者進行鬥爭的年代里建立了工農軍事政治聯盟：蘇維埃政權分給農民土地，保衛農民免遭地主和富農的壓迫，而農民則按余糧收集制供給工人糧食，並為保衛蘇維埃政權進行積極的鬥爭。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9頁。

②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306頁。

國內戰爭結束後，工農聯盟的這種基礎就已經不夠了。當時必須給工農聯盟加上新的經濟基礎。這種基礎只能是在發展農業和社會主義工業的基礎上，在小商品生產者（農民）與社會主義工業之間建立正常的商品交換，即商業。工人階級與農民結合的交換形式在下一個發展階段上將為結合的生產形式所代替，但這時合作社集體農莊企業與國營企業之間的商品貨幣關係的必要性仍然沒有消除。

農民的不滿情緒乃是嚴重的危險，因為工農聯盟是蘇維埃政權的基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但是，在1921年，這種自發的不滿情緒不僅籠罩了農民，在一定程度上也侵入到工人階級中去。如果說，當時最優秀和最覺悟的一部分工人，奮不顧身地忍受着各種艱難困苦，為恢復經濟而不屈不撓地進行了鬥爭；那末另一部分覺悟不高的工人，則因許多企業停工，不得不從事手工業，跑到農村去，漸漸失去階級地位不成其為工人。於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基礎開始削弱了。

在這種條件下，提高農業是恢復國內被破壞的經濟和改善政治局面的關鍵。列寧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指出了這一點。為什麼要在1921年把發展農業和改善農民生活狀況的問題提到首位呢？在經濟上，這是因為只有增加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才有可能恢復工業，把工人固定在城市中，杜絕工人流往農村的現象。在政治上，這是因為增加糧食和原料的生產，使農民能在市場上出賣剩餘的農產品，蘇維埃政權就能消除籠罩着大部分農民甚至於個別工人的不滿情緒。這就可能保持住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社會基礎——工人階級，鞏固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工農聯盟。歷史發展的辯證法迫切要求，為發展社會主義成分的生產力，為發展國營工業，就必須提高小商品生產的生產力。列寧關於這點說道：

“結果，1921年春形成的政治形勢，要求必須立刻採取最堅決最緊急的辦法，來改善農民生活狀況和提高他們的生產力。

為什麼不是改善工人生活狀況，而是改善農民底生活狀況呢？

因為改善工人生活狀況，就需要有糧食和燃料。從整個國家經濟說來，此刻最大的‘阻塞’正是從這裡發生的。要提高糧食底生產和收成，增加燃料底採辦和運輸，只有首先改善農民生活狀況，提高他們的生產力。應該從農民方面開始。誰若不明白這點，誰若認為把農民提到第一位就等於‘放棄’或類似放棄無產階級專政，那他簡直是不去實地思索，而陷入空談。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政策的領導。無產階級這領導階級，即統治階級，應當善於規劃政策，要首先解決最刻不容緩和‘迫在眉睫’的任務。現在最刻不容緩，就是那種能夠立刻提高農民經濟生產力的辦法。祇有經過這種辦法，才可達到既改善工人生活，又能鞏固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那些想不經過這種辦法來改善工人生活的無產者或無產階級代表，實際上祇會是白黨和資本家的走僕。因為不經過這種辦法，就無異是把工人的行會利益看得高於階級利益，就無異是為了工人直接的，一時的，局部的利益，來犧牲整個工人階級底利益，犧牲工人階級專政底利益，犧牲工人階級聯合農民反對地主資本家這一聯盟底利益，犧牲工人階級在為解放勞動擺脫資本桎梏的鬥爭中之領導作用底利益。

總之，首先要採取緊急和嚴重辦法來提高農民底生產力。”^①

布尔什維克黨第十次代表大會根據列寧的報告，通過了從余糧收集制過渡到糧食稅，過渡到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極其重要的決議。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出發點是，認為農民對經營的興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856—857頁。

趣能使農業迅速恢復起來，在這個基礎上，就有可能恢復工業，排擠私人資本，為建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積聚力量，着手進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轉而向資本主義成分展開全面的堅決的進攻。

共產黨正確地估計到，實行糧食稅和剩餘農產品的貿易自由，雖然會引起資本主義成分的某些活躍，但是農業和工業的高漲卻能保證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蓬勃發展；這就使工人階級和蘇維埃國家有可能向資本主義成分展開進攻，從限制，排擠而後到消滅資本主義成分；社會主義成分與資本主義成分的鬥爭必定導致社會主義成分戰勝資本主義成分。列寧曾指出說，新經濟政策的俄國一定會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

斯大林同志的下述的一些原理極其明確，極其深刻地揭示了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與特點：

“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國家所採取的一種特殊政策，它預計到在一切經濟命脈操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條件下容許資本主義存在，它預計到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間的鬥爭，預計到保證社會主義成分底作用不斷增長而資本主義成分不斷削弱下去，預計到社會主義成分戰勝資本主義成分，預計到消滅階級和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①

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主集中派以及其他反黨集團執行着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綫，把新經濟政策解釋為違反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列寧和斯大林揭穿了黨的敵人，闡明了新經濟政策的兩重性，說新經濟政策本身既包括退却也包括進攻。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由於實行新經濟政策而作了退却，容許了資本主

①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3頁。

义成分的存在，整頓了自己的隊伍，在整个國民經濟高漲的基礎上向資本主义成分展開了有計劃的進攻。僅在实行新經濟政策的第一个年头，農業的發展就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鞏固了工農聯盟，加强了無產階級專政。在这个基礎上就可以着手恢復工業和運輸業。蘇維埃國家掌握了國民經濟的一切命脈——大工業，運輸業、土地、銀行、對外貿易和大部分的國內商業，——這就在整個經濟戰線上達到了有利於社会主义的轉變。

1923年，蘇維埃政府降低了工業品價格，实行了幣制改革，確立了穩定鞏固的幣制。在這個基礎上克服了因破壞現象尚未消除而感受到的、因托洛茨基分子和人民的其他敵人的破壞活動而加深了的嚴重的經濟上的困難。

1925年，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業已將近結束。農業達到了戰前水平的87%，而工業則提高到戰前工業產量的75%。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剝奪地主和資本家，變土地、工廠、礦井、礦山、油田、交通工具和銀行為全民的財產，实行新經濟政策，建立國營社会主义工業，实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限制與排擠資本主义成分，——這就是保證恢復蘇聯國民經濟的條件。

1925年，十分尖銳地提出了國家發展前途的問題，即社会主义在蘇聯的命運問題。在一方面竭力鞏固和擴大社会主义的基礎，另一方面又暫時讓資本主义得到某些發展的新經濟政策軌道上，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社會呢？究竟應循着什麼方向進行蘇聯的經濟建設？是循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呢，還是循着資本主义的方向呢？黨在約·維·斯大林的領導下，依據列寧關於在單獨一個國家里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學說，對於這些問題給予了明確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在發展列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時指出了社会主义在一國獲得勝利問題的兩個方面——國內方面和國際方

面。

斯大林同志指出：1917年10月，我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戰勝了資本主義，並採取了種種辦法，以期摧毀資本主義的經濟實力，為建成社會主義創造條件，我國工人階級能夠而且也應該在經濟上擊潰資本主義。工人階級在解決這一任務時，能夠克服工人与勞動農民之間的非對抗性的矛盾，把農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濟上戰勝本國資產階級，並建成社會主義。

“無論西歐各國革命的延遲爆發，亦無論非蘇維埃國家中的資本主義局部穩定，都不能阻止我們向社會主義前進的行程。新經濟政策只會促進這一事業，因為黨施行新經濟政策的目的，也就是要促進我們國民經濟社會主義基礎底建設。”^①這就是斯大林同志和黨對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問題的國內方面所作的回答。

至於談到問題的國際方面，即關於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間的外部矛盾，那末只有消滅資本主義包圍形勢才能獲得解決，而要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形勢，只有靠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達到。“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即表現於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勝利，還不能算是最終的勝利，因為外國實行武裝干涉和企圖恢復資本主義的危險依然沒有消滅，因為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免除這種危險的保障。要消滅外國資本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便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形勢。”^②

①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335—336頁。

②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336—337頁。